

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

(摘自“红色文化网”2019年6月11日)

三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及其当代价值

辛向阳

1919年初，在夺取政权1年多后，红军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各个主要战线击退了14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进攻，收复了大部分地区。但是，1919年3月，军事局势发生极大逆转，苏维埃俄国在各条战线上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连年的战火使铁路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运输梗阻，燃料匮乏，粮食饥荒十分严重，国内经济状况相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呼吁彼得格勒一切有较高觉悟的有组织的同志去做军事和粮食工作。5月7日，在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很快，这个由苏俄各级党团机构号召和组

织的活动，变成了百姓自发参加的公益性活动。它持续了70多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使得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为此，列宁给予了积极评价。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积极价值。第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表现出的首创精神是我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滋养。第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表现出的首创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是永恒的，但其表现形式是可以多样的。各地、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义务劳动就是新形势下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具体体现，更是这一活动的时代化、规范化、法治化。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5期)

四 有关文化名家郭沫若的流言及真伪

李 斌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学、史学、考古学、翻译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成就，在20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饱受争议。笔者对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首先，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郭沫若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最后，郭沫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基于这三点基本认识，笔者选择了有关郭沫若的婚恋情况、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十七年期间的表现、《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等流言，逐一分析这些流言的产生、传播，并通过可靠的文献史料揭示了真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流言？而且集中针对1949年后的郭沫若？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1978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掌握话语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些人复出了，这批复出者对于当年的当权者多少有些意见。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了。在郭沫若的时代，学术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